

现代性视域下的文学认同话语建构

杨向荣, 杨 迪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现代性的深入一方面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生存。这种困境主要体现文学话语的失语所导致的认同危机。在这种语境下, 文学中强调认同话语的建构意识也日益强化。文学认同话语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文化寻根、文学怀旧和话语重塑。

关键词: 现代性; 文学; 认同话语; 建构

认同(identity 又译为身份)是当代学术界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汇, 其内涵相当丰富。认同是对身份的确认, 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 是对自我身份的寻找和确认。认同的过程, 就是人们通过他人或社会确认自我身份的过程, 也就是在自我之外寻找自我、反观自我的过程。在西方哲学中, 对认同理论的探讨最早是从精神分析学派开始的。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提出“同一化”(Identification)概念, 强调在拉近距离与疏远距离的矛盾中保持与“他者”的关系。拉康则认为, 主体是在镜像阶段把自我与“他者”区分开来, 从而使自我获得一种自我确证的完整性。在拉康看来, 自我的认同过程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在镜像中获得了对自我的“所思”, 而另一个方面则是在语言的形成中使得自主性得以塑造, “我在语言当中认同了自己”。^[1]拉康在这里已注意到个体在想象层面上的认同现象, 即对于一个“理想自我”或“完善自我”的设定, 虽然这个理想的自我只是个体在想象层面展开, 缺乏现实的实在依据。从弗洛伊德到拉康, 认同理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但总体来说, 精神分析学派的认同理论更多是局限于对个体的自我意识的挖掘, 他们过分注重从精神的内在主体意识层面区分自我与他者, 因而缺乏一种文化与社会语境或视域。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局限于主体性的认同理论慢慢融入到文化与社

会的语境之中, 并获得了丰富的阐释空间与阐释向度。台湾学者廖炳惠在其所撰写的《关键词 200》中这样定义这一术语: “‘认同’这个字眼在 90 年代后, 成为跨学科国际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实际上, ‘认同’并不是一个极为晚出且新兴后起的概念, 在哲学的研究范畴中, 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等人, 均将‘同一’(identity)和‘差异’(difference)相互对照。直到 60 年代后, 因为多元文化的身份开始备受关注, 且政治、文化和公民权也时常因为身份认同的差异而出现各种不同的组合, 人们开始发现身份与‘认同’之间, 存在着不固定性与复杂交混的多元性格, 因此, ‘认同’才从早期哲学与人类学固定单一想象, 慢慢转移到对社会、性别、国家与文化属性认同的探讨。”^[2]而阎嘉则认为: “在当代文化研究中, identity 这个词具有两种基本含义: 一是指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 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用‘身份’这个词来表示。……在另一方面, 当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认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 identity 可以叫做‘认同’。”^[3-4]不难看出, 在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中, 认同具有不同的意义指向, 而其中尤其突出的则是“认同”和“身份”两种指向。而这两种含义是密切相关的, 它们是基于“同一性”而产生的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语)概念。

*收稿日期: 2008-11-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民俗叙事研究”(07JC751002)子课题“伪民俗叙事研究”

作者简介: 杨向荣, 男, 湖南长沙人,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西方美学与文化研究; 杨 迪, 男, 湖南长沙人,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可见,在现代性的展开中,认同理论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精神学领域,而是延伸到了现代生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在现代性的语境下,现代认同理论发生了转向,即认同理论由传统的心理层面转向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这主要表现在力图从哲学、社会学、文化等维度来解读认同理论。也就是说,对认同理论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主体性的自我当中,而更侧重于将自我与社会及文化联系起来,并强调在文化与社会的语境中加强与“他者”的交流,在与“他者”的交流中获得一种认同感。

一 现代性与认同危机

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将前现代社会称为“共同体”,即乡村的世界,它是个体之间联系紧密的社会,而“社会”,即都市的世界,是指分裂了的现代性社会。“共同体”的观念使人有强烈的归属感、邻近感和总体感,而“社会”则意味着碎裂、异化和距离。滕尼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出现导致了共同体的衰亡,因而使个体之间的距离被突显。滕尼斯的话意在表明:在前现代时期,个体是与某一个社会阶层、某一个封建联盟或者某一个行会组织捆绑在一起的。而现代“社会”摧毁了传统社会中的这种单一性,导致个体与周遭事物的分离:“社会”一方面使个性得以自立生存,并给予其无可比拟的肉体与精神的活动自由;而另一方面,“社会”又赋予生活的实际内容至高无上的客观性。正是现代社会的这种离散性,迫使主体极需突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距离,实现传统社会“共同体”的回归。由此可见,现代性的延展所带来的文化冲撞及文化危机意识是相当复杂和深刻的。对此,莱瑞恩指出:“只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在相对孤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身份问题。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这种动荡和危机的产生源于其他文化的形成,或其他文化有关时,更是如此。”^{[4] 194-195} 莱瑞恩的论述很具启发性,顺着莱瑞恩的思路,笔者以为,在现代性视域下,中国当代文学在与世界文学接轨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体现文学话语的“失语”所导致的文化认同危机。

文化危机延伸到文学领域,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学面临西方文化冲击而缺乏自我的话语权。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中常常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进而丧失了自我的声音。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语境中实际上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中国现

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长期以来,我们根本没有具有自我特色的文学话语系统,似乎一旦离开了西方文学或文论话语,我们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就成为了一个学术上的失语者,“想想吧,怎么能指望一个‘哑巴’在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怎么能指望一个患了严重学术‘失语症’的学术群体在世界文坛说出自己的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个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争中争妍斗丽!”^[5] 质疑表明,当代文学面临着严重的话语缺失症,其根本点就在于我们的学者们跟在西方人的后面依样画葫芦,结果反丢失了自己文化上的“根”。这种“根”的缺失,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就是身份认同意识的缺失。正如此,面对话语权的缺失,不少学者就纷纷提出,中国文学应当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认同危机的另一种表征则是文化的拼盘杂烩和多元混杂化。混杂化是不同的文化要素交错混合的状态,意指既非本土,又非他者,而是本土与他者融合相混的一种文化形态。对此,弗里德曼指出:“文化彼此流动并混合起来。时尚通过移民、媒体传播等方式所形成的文化的运动越多,那么,混杂便越普遍,直到我们拥有一个混杂的世界,从文化角度看,它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一致的。这种情况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文化的本质就在于彼此流动,它们源自各自分离的源头,但却产生了混合,不过仍保持其本原的种种特性。”^[3-4] 全球化的日益扩展与现代性的日益深入,文化的混杂性也就越明显。传统文化的本土性与原生性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在本土文化中的生根。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文化的混杂性虽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异质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势必会导致原有的本土文化认同危机的生成。

深入分析下去,笔者以为,当代文学认同话语意识的缺失,其深刻历史根源就是中国当下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发展及其危机的呈现。反观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有一个趋势似乎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文学已不可阻挡地转向市场经济的轨道,随之而来的是市场性和消费性的文学。基于消费社会及其相应的消费文学要出现,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这种新的文学视域中,作家与理论家们将扮演如何角色?消费社会似乎已将传统的处于神坛之上的艺术家抛到的历

史的故纸堆中,而作家与理论家们面对大众,似乎也再也无法认清自我在消费浪潮中的角色及其定位。无疑,角色的迷失是社会与文化的历史激变所必然产生的文化认同危机感。毕竟,历史出现了非连续性,断裂的历史意识使文化呈现出裂缝,而这种历史意识的断层的一个深刻结果就是不确定性和无限可能性的现实生存。而这种现实状况,很容易使个体在悬浮的无根现实中无所适从。

历史意识断裂中的“角色迷失”,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理论来分析,则是一种“范式”的缺失。在库恩眼中,一个社会的运作基于一些共同体的运作,而共同体之所以能发生作用,则有赖于这个共同体所共有的学科规范,而这种科学规范就是“范式”(paradigm)。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写道:“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同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一个范式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人组成。”^[6]库恩认为,在这种共同体当中,成员之间的交流相当充分,专业判断也相当一致。“范式”也就是法国社会学家鲍曼所言的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所拥有的话语权力。鲍曼认为,在文学和美学领域,现代知识分子共同体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曾扮演过“立法者”角色。“在整个现代时期(包括现代主义时期),美学家们依然牢牢地控制着趣味和艺术判断领域。这里的控制意味着不受任何挑战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为确定性,意味着做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加以限制性的规定。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7]所谓“立法者”,就有具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他们专事于理论探讨,不断对各种文化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价值判断。他们之间的立论、辩论和结论,就是文化“合法化”的“立法过程”或“自主化过程”。

沿着库恩和鲍曼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把当代文学认同的基础理解为一定文学共同体中所达成的某种共识,而这就是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眼中的“文学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在18世纪末,书籍、杂志和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作家、出版社和书店也是与日俱增,借书铺、阅览室以及读书会等广泛建立了起来,于是在德国(在英法也有类似的现象)就出现了一个具有批判功能的文学公共领域,其中的公众通过阅读和讨论,相互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公共交往网络,他们彼此平等,自由讨论,依据多数原则进行决策。^[8]在哈贝马斯看来,现存

一切知识和艺术都是通过讨论而形成的一种共识、一种话语的协商,文学公共领域的一切规则都是不同的协商者通过平等的讨论与对话而形成的。这些协商者就是迪基所言的赋予艺术品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个体,就是后来知识分子的雏形,他们的一些共同话语决定了艺术世界的规则,形成了艺术世界的惯例。可以发现,不论迪基的“习俗论”,还是哈贝马斯的“文学公共领域”,都与库恩和鲍曼的观点形成了某种呼应。

然而,在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期待在一个文学共同体中所达成某种共识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望。应当说,在这个以技术为手段、市场为媒介和欲望为动力的世界中,个体所生存的世界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原子化的碎片世界。在断裂的历史意识和欲望化的生存表征中,人们不断地追问现存文化的合法性,又不断地企图寻找重新合法化的根据。当前文化的这种困境已成为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普遍的角色认同危机是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所带来的必然产物,是从封闭的政治导向文化体制向开放的经济导向文化体制过渡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一言以蔽之,文学认同话语意识的缺失是在现代性语境下所产生的一次空前的文化危机。

二 当代文学的认同话语建构

历史出现了断裂,当某种文化或文学现象面临巨大纷争和分歧时,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历史和文学正面临着“合法化的危机”,这种危机也就是一种认同的危机。在文化的认同危机中,文学作为一种日常的表意实践体,它在认同话语的建构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面对文化的认同危机,文学应如何变对,民族文学认同话语又应当如何建构?笔者以为,当代文学认同话语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化寻根、文化怀旧和民族话语重塑。

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历史文化转型,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当下文化处境和自我文化身份产生了深刻的焦虑,他们转而希望通过对传统历史文化之根的挖掘来确证自己的存在意义。挖掘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精华,回归到传统文化之中,在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中实现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这是对文化之根的寻找,是一种立足于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回归。应当说,这是当代认同话语的一种建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希望在对文化之根的回归当中找到自身的归属,进而获得认同之感。

这种对文化之根的追寻最为突显地体现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中。韩少功在《作家》上

发表《文学的“根”》, 郑万隆在《上海文学》上发表《我的“根”》, 阿城在《文艺报》上发表《文化制约着人类》, 李杭育在《作家》上发表《理一理我们的“根”》。这些寻根文学作家们先后亮起了各自的理论宣言, 不仅思路与观点趋同, 甚至选用的字眼“根”也完全一致。在韩少功《文学的“根”》这篇被公认为“寻根文学”宣言的论文, 以及他的另一篇文章《关于文学“寻根”的对话》中, 韩少功主要表述了两种互为联系的观点: 一是“文学有根, 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 二是文学的“寻根”, 要“寻找我们民族的思维优势和审美优势”; 三是面对有“深厚精神”的“民族的自我”, “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 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9]简而言之就是, 理当植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中国文学也应该使这种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命和新的光彩。郑万隆则认为, 要“力求揭示整个民族在历史生活积淀的深层结构上的心理素质, 以寻找推动历史前进和文化更新的力量。在创作中, 这种历史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变革, 表现为一种处理素材的时空观念, 一种唯物主义出发点和超个人的人生态度, 即: 空间是永恒的, 时间——昨天和今天, 过去和现在, 历史和现实——是共存的。”要“注重这种时间的主体性, 深层的传统文化结构等等, 目的在于融社会于个性之中, 融历史于人物心理之中, 表现出多元合成的历史结构中的积淀着的‘人的本性’等等”。^[10]

为了给他们的理论宣言寻求经验支撑, 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 不少作家就纷纷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内在层面, 期望在文化的回归或怀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根。伴随着“寻根”文学的兴起, 作家们坐而起行纷纷创作“寻根”文学作品, 贾平凹创作了一系列向商洛文化寻根的作品, 韩少功创作了多篇表现荆楚文化的作品, 阿城写了《棋王》《树王》《孩子王》等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作品, 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对在传统之根的挖掘中来塑造着文学话语, 而这种对“根”的追求, 实际上也就是对自我传统的一种认同意识。然而, 对文化之根的追寻也使当代知识分子呈现出一种两难心境。在寻根的追索体验中, 本土与西化交汇成碰撞的两极, 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焦虑便产生于文化的两极冲撞之间。无论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现代文化,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都表现出了既亲近又疏离的矛盾情绪, 在“我性”与“他性”的观照定位上, 作家们陷入了尴尬状态。李杭育在《文化的尴尬》中对

这种矛盾作了表白: “一方面, 很清楚地知道我所承受的民族意识有多么糟糕, 一方面又不得不顽固地捍卫它, 生怕除此而外我就什么也没有了。”^[11]应该说, 这不仅是寻根文学倡导者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之间的两难, 而且也是新时期文学转型所面对的历史选择的和文化判断上的一个深刻的悖论。

与文化寻根一样, 文化怀旧也是重建当代认同的一个主要策略。这主要体现为中国当代文学对传统经验的怀念。这是一种期望回归而不得之后的文化策略。当代文学中的失声让文学创作者们产生了迷惘与失望。但迷惘之后, 努力寻求自身的根, 寄希望在对传统的追求中找到认同感。但最终的回归又终不能实现。既然回归不了, 那么就缅怀好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 当代文学便转向对传统文化经验的怀念。这正如史密斯所言: “民族及其认同在民族的可信性记忆、符号、神话、遗产及本土语言文化被表述和展示出来, 它构成了共同体的历史和命运, 它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试图在一个自治的家园, 通过文化的教育机构, 来证实、保卫和体现其遗产的文化。”^[12]在当代文学世界中, 老照片、老房子、老风俗、老民居成为一种让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话题。当代知识分子期望在这种想象性的空间中获得些许安慰, 实现对自身传统的认同。因此, 这种对文化的怀旧情结, 可以视为重温家园感的心绪之表达。

怀旧意识在当代文学写作中还通过另外一种隐在的模式得以表征, 即乡愁意识。对此, 社会学家戴维斯有过精辟的分析: “乡愁意识产生于历史的转变, 它源于主体缅怀历史的断裂体验。”^[13-14]而另一位社会学家特纳则认为, 乡愁意识应当从四个方面得以确证: 第一, 乡愁基于一种历史的后退感和失望感, 它带来的是个体对传统的“理想家园”的怀念; 第二, 乡愁给人一种价值感的丧失, 在乡愁意识中, 传统的整体性的、确定性的、具有伦理规范性的统一价值观成为碎片; 第三, 乡愁所带来的是一种个体性意识的丧失, 即随着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改写, 传统的个体自由感和自主性在现代社会中荡然无存; 第四, 乡愁所带来的还是一种个体本真性和单一性的丧失, 由此所带来的是对这种单纯本真个性丧失的感怀。^[14]沿着戴维斯和特纳的分析, 我以为, 乡愁意识产生的最终根源在于主体对已逝的那些美好事物的追忆怀念。乡愁意识则总是与“传统”无法分离, 乡愁是一种对过去美好事物的肯定。然而, 乡愁又总是一种在当下历史中的表述, 乡愁实际上告诉我们的不是关于过去的事情, 而是在与过去的

对读中挖掘现存的境况和问题。

深入分析发现,我们发现,乡愁意识的出现,其实也就是对现存文化的一种否定,它是现存文化“合法化”危机的一种表征。而对现存的历史,乡愁往往体现出一种否定的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乡愁是对一种无家可归感的反应,是对传统失落的本真性忆念。因此,当文化出现危机之际,不少的文学写作选择了对乡愁意识的表达,选择了向传统的怀旧和回归,企图在“重新历史化”中实现对当代文学的救赎。乡愁是基于对传统的怀念,正是由于传统的“美好”在现代的消逝,才引发个体对已经逝去的生活和事物的留恋,它企图与过去的“美好”保持一个历史的连续性。也就是说,乡愁始终指向过去,它是对传统的回归与怀念。在这个意义上,怀旧情结和乡愁意识其实也是现代文学中认同意识建构的一种表征。

当代文学认同话语建构的第三个维度是民族话语的重塑。这在当代文学中主要体现为希冀以一种民族性的叙事话语来建构一个全新的文学世界。民族性的话语实际上就是一种认同性的话语。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就属此例。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中国百年民族历史史诗性的重新写作。《白鹿原》称为史诗性写作,不在于它是一个民族历史的真实展示,而在于它的叙述成为对一个民族“重新历史化”的建构和展示,它是在当下的意识结构中向传统的回归和解读。与史诗化的写作相对,民族性叙事话语的表达还体现在苏童、叶兆言等创作的景观化历史的展示中。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童的《妻妾成群》和叶兆言的《追月楼》把解放前的江南水乡描绘成一个神秘而又迷人的景观世界。这些作品所展示的历史景观具有很大的新颖性,迎合了当下消费社会的猎奇心理,后来成为历史小说写作和电影改编的常规操作。这两种写作都把历史转化为当代的文化消费产品,其实际效应是个体与历史的更为远离。

民族话语的重建还体现在当代文学创作者在其作品创造出一种民族神话。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当中的弱势地位所决定的。这种弱势性使得中国的文学创作者不敢面对现实,但又不甘于自身文学的弱势性,因而在文学创作中努力塑造一种理想的民族神话,进而陶醉在这种神话当中,实现一种精神认同。如王安忆的《小鲍庄》就是一个依

据小村庄编织的“传统性”神话。作者化解了原始洪水故事,大禹治水的传说和图腾意识,在小说开头编织了一个美丽的现代神话。结构上以开头的“引子”、“还是引子”和结尾的“尾声”、“还是尾声”,渲染出一种神话氛围,构建故事的总体神话框架。作品借原始的神话形态来审视现实世界,这样,对于文化之根的寻觅实际上就是对这个原始神话形态的寻觅。

中国当代文学以文化寻根、文化怀旧和民族话语的重塑来实现文化身份的认同,通过这些方式,当代文学参与到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与交流当中,寻找到了自身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位置,这无疑有利于当代文学对自身文化处境以及我们古老民族身份认同的确立,也有利于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多向度的对话与互动。

参考文献:

- [1] 拉康.拉康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311.
- [2] 廖炳惠.关键词200[M].台北:台湾麦田出版社,2003:135.
- [3] 周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4] 莱瑞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 [5]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J].文艺争鸣,1996(2).
- [6]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8-159.
- [7] 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79.
- [8]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
- [9] 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4).
- [10] 郑万隆.我的根[J].上海文学,1985(5).
- [11] 李杭育.文化的尴尬[J].文学评论,1986(5).
- [12] 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18.
- [13] Fred Davis. yearning for yesterday: Sociology of Nostalgia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 [14] Bryan S. Turner. a note on nostalgia [M]. Theory & Culture & Society, 1987: 4.

(责任编辑:黄声波)

ABSTRACTS

(1)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YANG Xiang-rong YANG Di (004)

Literature & News Department,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has brought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to a wider space as well as a predicament. The predicament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identity crisis of literature discourse because of its being voiceless. In this context, the sense of constructing identity discourse becomes increasingly stronger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discourse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cultural root-seeking, cultural nostalgia, and re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Key Words modernity; literature; identity discourse

(2) Narration of Marxist Technology Culture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heory

LI Sheng-qing (009)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Marxist thought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ents itself as a practical and critical nar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e.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 means a historically specific inspe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is to interpret from a realistic perspective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nature, aim, and value mod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apitalist contex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actically function as capitalistic ideology. In reality, this interpretation supplies guiding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reasonabl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cept and for the human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words Marxis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 realistic significance

(3) Transformation of Folk Literature in Modern Times——Taking Ancient Miao Song in Western Hunan as an Example

TIAN Mao-jin, XIA Tai-ping (013)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Ancient Miao song is a representative text of folk literature. As a national epic, it has reflected the general picture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ity industry i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at present. Rich in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element, ancient Miao song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vity industry. It is practicable and possible to industrialize ancient Miao song and to get characteristic culture product.

Key words ancient Miao song; cultural creativity industry; folk literature

(4) On Balter's Concept of "the Death of Author"

TANG Fu-rong (017)

Literature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After Balter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he death of author", the author's dominant status was